

北斗丛书



FO XUE YAN JIU SHI BA PIAN

佛学研究十八篇

梁启超

LIANG QI CHAO

北斗丛书



FO XUE YAN JIU SHI BA PIAN

佛学研究十八篇

梁启超

LIANG QI CHA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学研究十八篇 / 梁启超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

(北斗丛书)

ISBN 978-7-5399-2668-1

I. 佛... II. 梁... III. 佛教—研究—文集 IV. B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1372 号

书 名 佛学研究十八篇

著 者 梁启超

责任编辑 孙金荣

责任校对 一 山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24.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668-1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1)
附录 佛教大事表·····	(16)
佛教之初输入·····	(19)
附录一 汉明求法说辨伪·····	(21)
附录二 《四十二章经》辨伪·····	(26)
附录三 《牟子理惑论》辨伪·····	(33)
印度佛教概观·····	(35)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原题《印度之佛教》)·····	(48)
附录 说无我·····	(72)
佛教与西域·····	(79)
又佛教与西域·····	(87)
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	(97)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125)
翻译文学与佛典·····	(138)
佛典之翻译·····	(173)
附录 佛教典籍谱录考·····	(175)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245)

说四《阿含》·····	(252)
说《六足》、《发智》·····	(267)
说《大毗婆沙》·····	(274)
读《修行道地经》·····	(289)
《那先比丘经》书·····	(291)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294)
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	(318)
附录一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	(341)
附录二 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 ·····	(346)
附录三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367)
附录四 《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	(387)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

佛法初入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纪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祐《弘明

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尝为太尉，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人同时出家种种诞说。又造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牒，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

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河北佛教渐以光大。及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

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涂^①。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正参半耳。

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膺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

^① 《高僧传·佛图澄传》：“石勒问澄，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支咒水上涌，旁僧嘉叹大圣。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

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瘼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记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

佛经妙义，故所游刃。”（《高僧传·安传》）此叙安威德，盖能略道一二。安值丧乱，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不挠不乱。安十五年间，每岁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安不通梵文，而遍注诸经，妙达深指，旧译讹谬，以意条举，后来新译，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大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束。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所至风靡，若慧远之在东南，其尤著也。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行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385）。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当于第五章以下分叙，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三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入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咨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讖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

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迷信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崇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顗，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顗、桓玄、王濛、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五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譙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后，儒者始与佛徒哄，前此无之也。两晋、南北朝之儒者，对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其在当时，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则道士也。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诸文，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其中如刘宋时道士顾宪著《夷夏论》，谢镇之、朱昭之、慧通、僧愍等驳之；南萧齐时张融著《门论》，周颙驳之；道士复假融名著《三破论》，刘勰著《辩惑论》驳之，其最著者也。所谓道教者，并非老庄之“道家言”，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及睹佛经，乃剽窃其一二，而肤浅矛盾，无一处。乃反伪造《老子化胡经》等，谓佛道实出于彼，可谓诞妄已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倡

所谓夷夏论者，此较足以动人。谢、朱辈本非佛徒，亦起而驳之，于学术无国界之义，略有所发挥焉，盖非得已也。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北朝则以势力相劫制。北魏太武帝时，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荐之魏主拜为天师，改年号曰“太一真君”。太一真君七年(445)，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曰：“荡除胡神，击破胡经。”其法则：“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兴大狱者，只此一役。元魏起自东胡，犷悍之性未驯也。后四年，浩亦族诛，备五刑焉。魏毁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复之，后转益昌。后七十余年，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又五十余年，周武帝建德元年(572)，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寻复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并无诛戮云。计自佛法入中国后，受政府干涉禁止者，仅此两次。时皆极短，故无损其流通。其间，沙汰僧尼，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

佛教发达，南北并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质言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南方并不盛行。其与释道异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王者之好恶为兴替

也。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鹭之。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问题。庾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诸类此者，不可枚举。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觐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发达之速实可惊。《释老志》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今录如下：

年 代	寺 数	僧尼数
承明元年(476)	6478	77350
延昌二年(518)	12727	不详
兴和二年(540)	3 万	200 万

前后六十四年间，而寺数由六千余增至三万，僧尼数由七万余增至二百万。以何故而致此耶？试检《释老志》中所记当时制度及事实，可以知其梗概。《志》云：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以内律制之。’……”

“和平初，昙曜奏：‘民有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洒扫。’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永平四年，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传委“维那”（僧职），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

“神龟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正光以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据此，可见当时制度：（一）有各种僧职，权力极大。最高者为“沙门统”，其下有“州统”、“都维那”、“维那”等；（二）僧侣有治外法权，非犯杀人罪不到法庭；（三）挂名寺户可避徭役；（四）犯罪者及奴婢，凭藉教力，可免罪为良；（五）假立寺名，可以侵占田宅，猥滥横暴。至于此极，佛法精神，扫地尽矣。其帝室营造之侈靡，犹令人惊骇。就中若灵岩石窟、伊门石窟，若永宁寺，据《释老志》、《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洛阳伽蓝记》诸书所

载,略可追想一二。使其至今犹在,或可大为我国建筑学上一名誉纪念。然当时民力之凋敝于此者,亦殊不让罗马教皇之营彼得寺也。至今过伊门、龙门间,睹石像攒若蜂窠。即在琉璃庙求魏、齐造像拓片,广搜之犹可得数千种。此实当时佛教兴隆之遗影留传今日者,而无数之罪恶苦痛即隐于其背。后此唐韩愈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议,虽庸妄可笑,抑亦东流极敝反动使然也。南方佛教,此弊固亦所不免。然其兴也,不甚凭藉政治势力,以视北方,清明多矣。以上叙佛教黑暗方面略竟,今还叙其光明方面。

四

从中国佛学史大量观察,可中分为二期:一曰输入期,两晋南北朝是也;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已渐图建设,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此不过举其概而已。输入事业之主要者,曰西行求法,曰传译经论。具详第四、第五章两章。建设事业,则诸宗之成立也。具详第六章以下。今欲使学者得一简明之概念,且略知各部分事业之联络,故以极简单之文句,先述如下(其有重要资料不能入以下诸章者,则于此处稍为详叙。望读者通前后参错观之)。

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中国亦不逾斯轨。然小乘之行于中国,时期甚短,势力亦弱,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也。后汉、三国所译经典,虽小乘较多,然大乘亦已间译。至两晋以后,则以译大乘为主业。诸大乘经中,方等先昌。支谶之《般舟三昧》,佛调之《法镜》,支谦之《维摩》、《首楞》,法护之《宝积》、《大集》、《普曜》,皆其先河也。般若之兴,亦

略同时。支谶之《道行》，法护之《光赞》，叔兰之《放光》，罗什之《摩诃》，皆其选也。此两部分皆起于西历二世纪中，而发达于四世纪末。《法华》之来，则在四世纪，法护、罗什前后两译。《涅槃》、《华严》最晚出，昙谶、佛驮所译，皆在五世纪初元。至五世纪初元，而大乘要经略备，小乘之四《阿含》亦次第完成。译事告一段落焉。道安此方弘法之祖也，遍注诸经，而犹精《般若》，可谓“空宗”最初之建设者。其弟子慧远，在庐山结莲社念佛，今之“净土宗”尊为初祖焉。罗什入关，气象万千，后此大乘之“三论宗”、小乘之“成实宗”，皆于此托始。其弟子僧肇、僧叡、道生等，皆为一时龙象。自此以前，为输入全盛、建设萌芽之时期。

在此时期中，有两种事实，颇足资研究兴趣者。其一，则小乘派殆无反抗力也。印度大乘初起，其与小乘之对抗极烈。即在今日之日本尚有持“大乘非佛论”者。独我国则大乘一至，靡然从风。其持小乘以非毁大乘者，今所考见，才得数人：一、慧导疑《大品般若》；二、昙乐非拔《法华》；三、僧渊诽谤《涅槃》；四、竺法度禁一切大乘经典，不听读诵（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末两篇）。僧叡著《喻疑篇》，专为当时疑《涅槃》者而发，中有言曰：“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璽流于秦地。”可知当时西域诸僧在中国者，非无反抗大乘之人，特力不足以张其军耳。其二，则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也。朱士行读《道行般若》，知其未尽，矢志往求（《高僧传》本传）；道安订正旧译诸经，其后罗什重译，适与冥合，初无乖舛（《魏书·释老志》）。凡此之类，具征深智。“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洞入幽微，说阿闍提人（译言多贪）皆得成佛。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迁众。旧学僧党，讥忿滋甚，摈而遣之。